

露絲·帕卡魯克：妻子、母親、朋友、社會運動者

露絲·帕卡魯克是一位格外溫暖且才華洋溢的女性。她以一位支持墮胎的無神論者的身分進入哈佛大學就讀。皈依天主教之後，她將自己奉獻於養育家庭以及投入支持生命的社會運動。33歲時，露絲被診斷出罹患癌症，並於41歲時安詳辭世。2025年9月29日，教廷封聖部頒發了「無異議」(nihil obstat) 的命令，批准露絲·

帕卡魯克的封聖案件展開教區階段的審理。她目前被尊稱為「天主之僕」。

2026年3月12日

這篇關於露絲·帕卡魯克的簡介，出自約翰·科弗代爾的著作與 Podcast 《相遇：在生活的各個面向尋找天主》。《相遇》介紹了一些人物側寫，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聖施禮華所傳揚的訊息——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天主。您可以在亞馬遜或 Scepter Publishers 購買本書完整版。

露絲·帕卡魯克在哈佛大學期間由無神論皈依基督信仰，並於畢業翌年成為天主教徒。作為七名子女的母親，她積極參與「生命權」(Right to Life) 運動，並在堂區生活中扮演積極角色，同時協助組織主業團的使徒工作。她在34歲時被診斷出罹患乳

癌，但直到七年後的1998年9月，在她41歲辭世前的一個月，仍持續過著正常的生活。

從無神論到天主教：經歷福音派信仰之路

露絲於1957年3月19日出生於美國新澤西州南橘鎮，那是一個位於紐約市郊區的小鎮。她本名露絲·伊麗莎白·范庫伊。她的父親是一位電機工程師，但他並未從事工程實務工作，而是選擇在一所職業高中任教，以此作為貢獻社會的方式。她的母親在孩子年幼時留在家中照顧家庭，之後則擔任行政秘書。在高中時期，露絲在一個由學生創立並管理的戲劇團體中，製作、導演並參演了許多戲劇與音樂劇。她是一位出色的歌手，被選入「全東區合唱團」。她同時也是技藝精湛的鋼琴演奏者，並在不同的音樂團體中演奏雙簧管、長笛、小提琴和大鼓。露絲亦是一名優秀的運動員，曾加入曲棍球校隊。童年時期，

她隨家人參加長老會教會的禮拜；然而到了青春期，她拒絕了父母較為自由派的基督信仰立場，並成為一名支持墮胎權的無神論者。

高中最後一年時，露絲曾考慮就讀空服員學校，因為「只要微笑，就可以看見全世界。」她還考慮過前往麥吉爾大學，那裡有位男孩——她晚年曾形容兩人之間是「近乎童話般的戀情」——計劃前往就讀。在一位當地拉德克利夫學院校友的建議下，她申請了哈佛大學。她無法拒絕哈佛的錄取，因為如果拒絕了，「我將永遠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與最優秀的人競爭。」

露絲在大一表現優異，隔年便獲邀擔任《空間、時間與運動》課程的助教。大二時，她的指定閱讀包含布拉德福德總督記述清教徒如何熬過在美洲第一個嚴冬的經歷。殖民地爆發瘟疫期間，他們相互照護所展現的英雄氣概與犧牲精神令她深受震撼，更與

自己享樂主義、自我中心的生命狀態形成強烈對比。「我要活得像他們一樣，」她暗自思忖，「我甚至不在乎這些人的信仰是否真實。我只想活得像他們一樣。」儘管聲稱不在乎基督教是否真實，她卻很快決心尋找能讓自己信服的真理。

幾年後，露絲寫給她的朋友說：

當我重新確信天主存在時，便理所當然地認為唯一理性的選擇是深入認識祂及其旨意——畢竟按定義而言，天主遠比世上任何事物更值得追求且更為重要。如今我難以理解或想像，為何有人既信奉天主卻不認為必須竭力將祂置於生命核心。此舉聽來或許令你倍感疲憊，但請思索這點——教會始終教導：上帝造人時賦予其追求幸福的天性，而唯有與祂合而為一，我們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而非短暫的歡愉或分心）。因此，將注意力持續轉向天主，實為人類最自然的本性。

在露絲教授的「空間、時間與運動」課程班級裡，有位名叫麥可·帕卡盧克的學生。這位曾是天主教徒的他，以宗教懷疑論者的身份進入哈佛大學。在大一升大二的暑假期間，他險些溺水身亡，此後便踏上探索基督教真實性的旅程。麥可與露絲開始交往，很快便陷入熱戀。麥可形容他們的「相戀過程與忠於共同渴望密不可分——那份渴望正是探究基督教是否可能為真的信念」。兩人身邊既無基督徒同學也無基督徒教授，這份釐清信仰真偽的決心，瞬間成為維繫彼此的羈絆。

露絲和麥可都深信關鍵在於如何生活。大二結束時，他們認定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就必須歸屬於一個基督教團體，於是開始參加位於劍橋公園的聯合教會公理會。隨著時間推移，他們對教會過度聚焦社會政治議題、卻對神學與靈性漠不關心的現象日益感到沮喪。儘管仍持續參與該教會禮拜，他們同時加入了哈佛大學的福音

派校園團契（IVCF）。原以為能在此頻繁參與哲學與神學議題的智性辯論，卻發現這裡充斥著情感激昂的氛圍，更強調維持積極樂觀的心態。

1978年秋天，露絲與麥可於她父母的長老會教堂完婚。當時哈佛大學的本科生中僅有寥寥數人已婚。帕卡盧克夫婦租了一間小公寓，過著極度節儉的生活。他們每週僅撥出二十美元購買食物——即便在當時也是微不足道的金額。之所以能如此節省，源於他們對全球飢餓問題的深刻關注，進而成為素食主義者。透過大量採購與拒絕加工食品，他們每日飲食支出壓低至七十五美分以下。他們奉獻十分之一收入——包含稅後所得與助學金——給教會、校園團契，以及兩家他們心儀的慈善機構：樂施會與世界之糧組織。起初露絲與麥可都堅決排斥天主教——露絲源於成長環境中改革宗教會的反天主教立場，麥可則認為童年名義上的天主教信仰是阻礙與基督建立個人關係的虛假宗教。當麥可

帶領的校園團契小組成員柯特宣布要接受天主教教理課程時，兩人皆深感震驚。這對夫婦與柯特長談，卻發現自己無法反駁他皈依天主教的理由。

他們接觸天主教會的重要契機，是馬爾科姆·馬格瑞奇所著的德蕾莎修女傳記。正如麥可回憶：

德蕾莎修女顯然是位虔誠祈禱的女性，一位真正的基督追隨者，更是一位聖潔之人。這對我們構成了難題：為何在虛假背道的基督教形式中，唯獨能找到我們眼中對苦難、虔誠與聖潔的真實詮釋？早期教會曾針對基督展開辯論：祂要麼是惡人，要麼是神，中間沒有灰色地帶。祂不可能僅僅是個道德導師。我們隱約感到此刻正面臨類似的困境。天主教會要麼極其邪惡，要麼極其崇高。然而德蕾莎修女卻讓前者選項顯得難以成立。

他們閱讀了大量關於天主教會與早期基督教歷史的書籍，尤其專注於耶穌會士約翰·哈登神父的著作。漸漸地，

他們開始認同教會在墮胎與避孕議題上的立場，並欽佩教會捍衛這些立場的勇氣。1978年聖誕節前後，他們決定停止使用避孕措施。麥可如此解釋他們的決定：

避孕所衍生的態度（即「避孕」心態）與基督徒應有的態度背道而馳。數世紀以來，基督徒始終拒絕避孕。人們很容易相信，多數基督宗派在這個議題上的教導之所以改變，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世俗化」——也就是隨波逐流——就如同許多教會在墮胎問題上的立場轉變一樣；而墮胎無疑是錯誤且不合基督信仰精神的。同時我們認為，若拒絕避孕成為現代世界中對基督真正忠誠的某種「試煉」，也毫不令人意外。依我們所見，每個世代都有其試煉——對每代基督徒而言，總存在某種世俗推崇而基督徒必須拒絕，或世俗排斥而基督徒必須擁抱的實踐；這實踐需要犧牲，對「世俗」而言毫無意義，但對基督徒而言卻是追隨基督真門徒的明證。既然此

類試煉必然存在，避孕手段似乎正是合適的選項。因此我們決定，身為基督的追隨者，應停止使用避孕措施。然而更關鍵的問題——是否該嘗試生育——我們並未深入探討。身為學生，我們僅憑直覺認定不該生孩子。

至1980年春天，露絲與麥可皆傾向加入天主教會。然而由於麥可獲得馬歇爾獎學金赴愛丁堡深造，兩人將於秋季移居蘇格蘭兩年，故不願倉促決斷。待抵達蘇格蘭時，露絲已下定決心，麥可卻仍存疑慮。在愛丁堡，兩人開始於大學天主教校牧室接受要理課程。露絲寫信給公婆：「我們的生活如此順遂——我常驚嘆於蒙受的恩寵之多且深。艱難時刻或許會來臨——這始終掌握在天主全能之手——但我並不憂慮。這一生能擁有我兩年內經歷的喜樂的人何其稀少！」平安夜當晚，麥可辦了總告解並領受聖體，露絲則正式加入教會並領受堅振聖事。

不久，他們開始參加每日彌撒。麥可解釋了他們的決定：

我們堅持，皈依天主教並未改變我們身為福音派基督徒的事實。如今我們是信奉天主教的福音派信徒，深信我們所珍愛並在福音派基督教中尋求的信仰精髓，在天主教會的聖徒身上得到了最純粹的守護與彰顯。作為福音派信徒，我們堅信每日應有「靜默時刻」，藉此與基督對話，建立個人化的靈性關係。我們渴望盡可能親近基督——正因如此，我們竭力效法初代基督徒的樣式。我們逐漸領悟到：彌撒是超越時空的主的晚餐。參與彌撒即是在主的晚餐桌前，與使徒們並肩而坐，在親近基督的層面上與他們完全平等。早期基督徒所享有的優先權，凡參與彌撒者皆能享有。既然如此，我們推論：還有什麼比參與彌撒並在其中祈禱更美好的禱告方式？還有什麼比這更能深化我們所追求的與基督的個人關係？因此，我們每日「靜默時刻」的實踐自然延伸為每日

參與彌撒。這並非意味著我們不追求在其他時段靜默祈禱、在「隱密處」禱告；但我們認為，每日最初可供祈禱的時光——如同時間的「初熟果實」——理當獻給彌撒。

露絲和麥可發現很難堅持每天參加彌撒的決心。他們能成功維持幾天或一週，隨後又會鬆懈一兩週。兩人皆認為這種狀況不可接受。他們意識到需要幫助，卻不知該尋求何種協助，或該採取何種形式。多年後，當他們初次接觸主業團時，立刻明白這正是他們長年尋覓的答案。

他們的長子麥可於1981年11月27日出生。據她丈夫所述，孩子的出生讓露絲變得更加無私。他回憶道：

夜裡有兩次，[麥可]發出些微的躁動聲響，露絲便立刻在黑暗中起身抱起他哺乳。這份奉獻令我驚嘆不已。當然，這很合理：當嬰兒夜裡啼哭時，你必須餵養他。

但我在露絲身上看過那種前所未見的直率、自然且不做作的無私。她從不抱怨，更不會在床上磨蹭片刻。嬰兒一發出聲響，她便立刻跳下床去照料他。

麥可的誕生也改變了露絲對墮胎的態度。在過去一年間，她深入研究了這個議題，並從理性層面確信墮胎等同於奪取無辜生命。這種信念因她接受教會對此議題的教導而更加堅定。她雖深信不疑，卻未曾真正投入反墮胎運動。丈夫注意到，隨著麥可的誕生，她開始以嶄新且更迫切的視角審視墮胎爭議。她自身也察覺到這份轉變，當時在談及友人流產經歷時寫道：自己再也無法「對他人孩子的死亡抱持哲學式的態度」，「過往看似悲劇的事件，如今細想竟是純粹的恐怖」。此刻她反對墮胎的立場，已深深植根於自身為人母的體驗，不再僅是哲學論證中冷靜理性的結論。

1982年夏天，在蘇格蘭度過兩年時光後，帕卡盧克一家重返哈佛大學，麥可開始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在他們於哈佛度過的六年時光裡，又迎來了兩個兒子——麥可斯（1983年6月出生）與約翰·亨利（1986年3月出生），以及女兒瑪麗亞（1987年10月出生）。他們曾短暫考慮送小孩去托兒所，但露絲最終決定不願讓孩子由他人撫養——儘管這些人或許稱職甚至友善，卻無法給予真摯的愛。

為補貼麥可微薄的津貼，露絲在房東那裡找了份兼職，負責簿記和一般辦公室事務。這份工作對她這般聰慧學識的人而言，本該極其枯燥乏味，但她專注於其優點，寫信給朋友說：

「這份工作很有趣，非常方便，收入也相當可觀。」

成為主業團成員

在蘇格蘭時，一位朋友曾贈予帕卡盧克夫婦一本聖施禮華的著作《道路》，但他們與主業團的初次接觸，

源於一位哈佛研究生在每日彌撒中看見麥可，並邀請他參加在哈佛附近主業團中心舉辦的夜間退省——該活動由薩爾·費里格勒神父主講。麥可深受所聞內容震撼。他回憶道：「這正是我皈依的天主教信仰，也是我在聖人著作與早期教會文獻中讀到的真諦。」他當即安排接受薩爾神父的靈修指導，並開始參加其開設的天主教教義課程。

當麥可向露絲解釋他對主業團的了解時，她表示認同，認為這似乎正是他們一直在尋找的：

自從我們皈依天主教以來，便意識到，在實踐內在生活時需要某種幫助，某種「外部結構」（我們如此向自己解釋）。首先，我們明白自己需要一位靈修指導者……主業團的神父們顯然是聖潔且學識淵博的教會人士，能夠提供這類指引。其次，我們意識到自己未能持續參與彌撒與誦念禱文。這方面的表現時好時壞，取決於環境艱

困程度或主觀感受；然而顯然有許多主業團成員，多年來始終在生活種種困難中，持守著嚴謹的奉獻生活。

露絲隨即開始參與主業團的培育活動，並接受薩爾神父的個人靈修指導。她稱薩爾神父為「我所認識最聖潔的神父」。薩爾神父對露絲亦深感欽佩，尤其欣賞她那股傳教熱忱。

大約一年後，在1984年夏天，露絲成為主業團的已婚會員。麥可則在數月前已加入該組織。他們開始實踐成員的生活計劃，參與學習圈及其他靈修培育活動，並以友誼為基礎，默默開展使徒工作。

他們也開始與其他與主業團相關的人士建立友誼，特別是珍與湯姆·哈迪夫婦。當時哈迪家有六個孩子，這個數字讓麥可覺得難以置信。「他們怎麼能應付得來？」他和露絲不禁自問。

「怎麼可能同時照顧這麼多孩子，還能負擔所有開銷？」然而當他們見識到哈迪夫婦兼具基督教理想主義、務

實智慧與勤奮精神——更驚訝於他們對「支持墮胎權」的犀利批判時，當即深受感動，渴望盡可能多與他們相處。

反墮胎的倡議者

露絲投身反墮胎運動的契機，源於她在哈佛大學參與的一場辯論。反墮胎發言人的有力論證令她深受震撼，而最令她震驚的，是支持墮胎發言人不願正視「墮胎等同殺害無辜生命」這項論點。她與哈佛教育學院研究生保羅·斯沃普共同創立了「哈佛-拉德克利夫夫人類生命倡導者」組織。

不久之後，許多與大學無關的劍橋居民也參與其中，露絲於是決定成立第二個團體，名為劍橋未出生者權利倡導者（CURA）。短短一年內，CURA便擁有超過三百名活躍成員，並在劍橋市發起多項活動，包括為全州性生命權組織「麻州生命公民聯盟」

（MCFL）募款；舉辦年度晚宴並邀請專題演講者；舉辦教育講座；派遣

巴士前往華盛頓特區參加年度「為生命遊行」活動；挨家挨戶分發宣傳冊；以及為孕婦募集食物、衣物和嬰兒用品。CURA將自身使命定位為教育宣導，但許多成員同時投身危機懷孕中心志工服務，並協助支持生命權的政治人物競選活動。

麻州生命權公民組織董事會成員

麻州生命權公民組織董事會成員透露，初次見到露絲時，「我的第一印象是她容貌出眾——外表極其美麗——口才驚人且極具智慧。我當時心想：『這正是我們需要培養的人才。』我們當即明白，露絲注定會成為璀璨之星。」

1984年，在深受CURA活力所感動的MCFL幹部敦促下，露絲參選並成功當選該全州性組織的董事會成員。她旋即領導推動一項州憲法修正案，旨在將墮胎權限縮至美國最高法院明確認可的範圍。該修正案雖以微弱差距

未獲通過，但公眾對此議題的辯論為傳播反墮胎觀點提供了諸多契機。

政治與社會活動

在1984年總統大選前，露絲寫信給一位朋友：

我即將成為一名註冊共和黨員。民主黨對墮胎的全力支持促使我轉變立場，但當我深入思考其他議題時，發現自己逐漸接近現任政府推崇的自由企業與最小政府理念。儘管我對其在污染等領域的政策上存在許多保留。我對軍備擴張也持強烈保留態度，但我深知墮胎等同於剝奪人類生命。這與宗教信仰無關，而是純粹的生物學事實。

選舉後的幾個月，她告訴同一個朋友：

我確實投票給了雷根。我甚至敦促他人效法，並協調分發約三千份傳單，目的在說服人們跟隨我的腳步。我這

麼做的唯一理由（或者說，我這麼做的首要理由）是墮胎議題。對我而言，墮胎殺害人類的事實顯而易見。我常自問：若生於希特勒統治時期，我是否會為屠殺無辜者辯護？即便明知發聲可能招致死亡，我仍無法想像自己能坐視社會縱容殺害無辜嬰孩。我不喜歡發傳單。我不喜歡示威遊行，不喜歡政治行動主義；但我沒有選擇沉默的自由。

儘管主要關注墮胎議題，露絲同樣憂心全球貧困與飢餓問題。儘管家庭預算極為拮据，帕卡盧克一家仍持續慷慨捐助「世界之糧組織」、「天主教救濟服務會」及「樂施會」等機構。露絲更撥冗撰寫信函，敦促美國對待貧窮國家時秉持更公平的態度。

麻州生命權公民組織主席

1987年，露絲當選為MCFL主席。她與保羅·斯沃普攜手推動各個辦公室的現代化，提升募款能力，並建立組織快速發布新聞稿的機制以應對突發事

件。在露絲領導下，MCFL實現了顯著成長。該組織的遊說能力持續擴張，成功在委員會層級阻擋數項支持墮胎權的州立法提案。

在他當選後的幾個月，她寫信給一位朋友：

我現任本州反墮胎組織主席，這份工作頗令人振奮。我需要招聘員工、頻繁應對媒體、做與電腦系統相關的決定、進行市場調查等。謝天謝地我不用朝九晚五上班——前任主席們大多如此。帶著三個男孩四處奔波已夠辛苦，但比起老闆，他們可靈活多了。

露絲在墮胎及其他「生命議題」上的演說天賦，早在擔任MCFL主席時便已顯露——當時她常受邀參與新聞節目或校園演講。她偏好辯論而非演說，即便主辦方未規劃辯論環節，她仍會設法說服對方邀請支持墮胎權的講者。「若舉辦演講，到場的不過數十名早已立場堅定者；但若舉辦辯

論，數百人會前來參與，其中許多人真正渴望了解真相。」

麻薩諸塞州伍斯特市

1987年，帕卡盧克一家遷居至麻州伍斯特市——這座距波士頓西行四十英里、擁有約十五萬居民的城市。麥可在此獲得了克拉克大學的教職，該校是所聲譽卓著的文理學院。從學術角度看，這份聘任頗具吸引力，但薪酬微薄。他們尋覓居所的過程，用麥可的話說，揭示了「美國經濟體系已不再為單薪家庭設計的現實。現實是，即便在相對廉價的城市裡，最不起眼的社區裡最便宜的入門級住宅，我們也負擔不起——因為如今雙薪家庭的收入，往往都追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他們最終只能蝸居於一棟破舊不堪的小屋，所在社區多為非法移民居住。搬入時，屋內沒有熱水供應，地毯已有四十年的歷史，幾乎沒有像樣的傢俱，爐灶和冰箱都亟待更換，而他們的汽車也已使用了十五年。

他們努力將開支控制在最低限度。有一次拜訪一對夫婦時，這對夫婦都是成功的行銷專業人士。他們詢問露絲為何選擇購買某種產品而非其他產品。

「很簡單，」她說：「我計算每單位的成本，然後購買最便宜的品牌。」

「你對品牌沒有偏好嗎？比如說，你不喜歡佳潔士牙膏勝過高露潔嗎？」

「佳潔士或高露潔！」露絲回答道：「你開玩笑吧。那些牙膏實在太貴了，就算打折也一樣。」

儘管收入微薄，帕卡盧克一家始終量入為出，從不覺得需要更多錢。他們持續奉獻什一奉獻。某年發現將獲得意外可觀的退稅款時，他們認為這筆錢不該用在自己身上，便捐給天主教救濟服務會，認為窮人比他們更需要這筆錢。

麥可回憶道，儘管經濟拮据，我們的家充滿歡樂，以獨特的方式蒙受豐盛的祝福。例如，每當放學時分，露絲總會為孩子們和他們的朋友們準備好現烤的點心；又或者在炎熱的夏日，她會把所有人——包括朋友們——都塞進車裡，載著他們去貝爾池塘或拉特蘭州立公園游泳。

搬到伍斯特約一年後，露絲獲邀加入主教座堂的專業合唱團。她欣喜若狂地寫信給朋友：

我又加入合唱團了。不是隨便哪個合唱團，而是主教座堂的專業合唱團。聽好了——我能領著薪水，不用帶孩子出門，還能唱美妙的音樂。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歌喉並非頂尖，但正努力精進。距上次專注於音準與和聲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幸好我視唱能力尚可，數拍子也比多數團員強（為何歌手普遍如此不擅數拍？）。

一個小孩的逝去

帕卡盧克家的第五個孩子托馬斯於1989年9月出生。出生七週後，他因嬰兒猝死症離世。全家陷入崩潰，但露絲與麥可擁抱這份苦難，並從中看見——用麥可的話說——「一種『嚴厲的慈悲』，是與基督十字架的共融，將帶來諸多祝福與恩寵」。托馬斯的葬禮結束後，麥可只想回家與家人獨處，或許睡一覺。露絲卻渴望慶祝。當殯葬彌撒結束離開教堂時，她雙手合十，綻開燦爛笑容說道：

「好，我們來辦場派對吧！」她要慶祝托馬斯已獲得天國的喜樂。

她渴望慶祝湯瑪斯在天堂的喜悅，並不意味著她感受不到失去幼子的痛楚，或未能為此哀悼。當有人評論說湯瑪斯既然在天堂，其實並未真正失去什麼時，露絲回應道：湯瑪斯失去的是「作為男孩成長的機會，以及享受天主所創造的世界中所有美好與歡愉的權利」。

數年後，一位剛痛失幼子的友人問露絲：失去孩子的傷痛是否永不痊癒？露絲如此回應：

心靈或情感的創傷，那份悲痛，與身體的傷口極為相似。它會悄然癒合。當心血淌滿地板時，你無法正常生活。你的兒子明白這點。然而，我每天仍會向托馬斯尋求慰藉。請為兒子虔誠祈禱，將這份心意融入日常禱告中。如此一來，你既不必擔心撕裂傷口，也不必害怕遺忘。

露絲本人養成每日沐浴後重新佩戴棕色聖衣時親吻的習慣，並如此祈禱：

願此吻成為對天上的母親瑪利亞的愛意——懇請她將這份愛意轉達給我的兒子托馬斯——請他為母親祈禱，為父親祈禱，為手足、祖父母與堂（表）兄弟姊妹祈禱，為父親（即主業團監督）的意向祈禱，並為反墮胎運動祈禱。

她感受到托馬斯正從天國注視著她，這份感知促使露絲在靈性生活中更加慷慨。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寫道：

托馬斯已很好地引導我走在狹窄的正道上。促使我履行規範（即構成主業團成員生活計劃的信仰實踐）的，並非默觀主耶穌的聖傷或十字架下的聖母。而是當我的嬰孩凝視著我時，那份羞愧感——他正疑惑著為何母親如此愚昧，竟認為打字編印通訊或摺疊衣物比祈禱更重要。

麥可回憶道：「露絲曾祈禱，盼望另一個孩子能撫平她的悲傷。當莎拉·艾絲特在托瑪斯離世不到一個月時受孕，並在他逝世不到一年後誕生時，她便如同聖經中許多婦女那般，將這份恩寵視為對她禱告的具體回應。」正如露絲後來向莎拉傾訴：「在失去小托瑪斯的悲傷與空虛之後，你為我帶來了無盡的歡欣與心靈療癒。你是天主賜予母親的珍貴禮物與祝福。」

33歲時罹患癌症

1990年7月，露絲懷著莎拉時，發現乳房有腫塊，但醫生向她保證無需擔心。到了1991年秋季，腫塊已清晰可見，她再次向醫生反映。儘管醫生再度淡化她的擔憂，露絲堅持要求進行乳房X光攝影檢查，結果顯示出四公分大的癌性腫瘤。同年十月，她因二期B癌症接受了根治性乳房切除術，並展開為期五個月的化療療程。

露絲從手術中迅速而輕鬆地恢復，但她寫信給朋友說：「化療實在令人不適。雖然真正讓我完全虛弱的只有兩三天，但之後還得輕鬆一週左右。」聖誕節時，她向另一位朋友傾訴：「我完全確信，無論結果如何，天主必會使這經歷結出善果。不過，若能多為我禱告，我仍會感激不盡。」

她在致一位癌症病友的信中寫道：

化療期間，我的生活並不完全正常。我花費大量時間沉思、祈禱與閱讀。儘管身心俱疲，我仍努力維持某些日常慣例——例如持續在高中進行反墮

胎演講。過程艱辛，但每次結束後總感到欣慰。前一晚還覺得不可能辦到的事——當天清晨將嬰兒託付保母、精心打扮出門——我卻總能咬牙堅持，最終發現自己確實辦到了。天主教靈修精神強調「將苦難奉獻」。這聽來或許有些不切實際，但我發現它極具助益。耶穌從天而降，正是為了與我們共度人生。祂甚至願與我們同嘗痛苦、恐懼、孤獨與煎熬。當遭遇這些苦楚時，默想獨自承受十字架之痛的耶穌，便能帶來力量。我們渴望效法祂，願與祂分擔苦難、與祂相伴，而非像伯多祿、雅各和若望那樣沉沉睡去。祂必接納我們在試煉中的堅忍，如同祂的復活，將苦難化為榮耀。

她告訴另一位癌症患者，化療期間自己總感到隱隱作嘔。

但對我而言更難熬的是心理層面的煎熬。我向來不是個愛操心的人，鮮少受焦慮或抑鬱困擾。然而化療期間，我卻會經歷劇烈的恐慌發作。明明正

舒適地坐在沙發上，心臟卻會突然狂跳，腎上腺素湧現，全身出現徹底恐懼的所有症狀。我試圖告訴自己無需害怕，來驅散這些症狀，但卻毫無作用。我確信這並非對死亡的壓抑恐懼，純粹是化療的副作用，在治療結束數週後便消失無蹤。這正是我想向各位傳達的體驗：化療後的生命依然美好。無論療程中你感到多麼病弱、疲憊與沮喪，當一切結束時，你終將恢復原本的狀態。有些人開始認為化療期間的感受源於癌症本身，但事實並非如此。這純粹是化療藥物帶來的影響。

化療結束幾週後，露絲告訴朋友：

「我終於感覺自己像個正常人了。身體好起來的感覺真棒——當你長期處於隱隱作痛的狀態，會忘記正常感覺有多美好。最近光是能正常品嚐味道、嗅聞氣味，就讓我整天雀躍不已。真希望永遠保持這種狀態，不再

視之為理所當然，但這就是人性吧。」

露絲的主治醫師建議至少等待三年再嘗試懷孕，屆時癌症復發風險會降低。

若過早懷孕，癌症可能隨時復發，而懷孕將限制多種治療方式，甚至可能加速癌細胞生長。露絲與麥可仔細斟酌醫生的建議，並向天主尋求光照。然而最終，正如露絲所言，他們認為「與其畏縮於恐懼中，不如懷抱癌症不再復發的希望活著。即使生命可能因癌症復發而縮短，我們仍認為生育更多孩子是件美好的事。」不久後她懷上安娜·索菲亞，孩子於1993年4月誕生。

醫療疏失的訴訟

麥可回憶道，當露絲得知自己罹癌時，最初的反應是感到羞辱，彷彿被耍得團團轉，因為她深信醫生「不是癌症」的診斷，竟讓易於檢測的惡性

腫瘤，在她乳房內肆意生長整整一年。她經歷了一段極短暫的情緒動盪期——僅僅一兩天——先是對醫生充滿憤怒，隨後轉為憐憫與寬恕。

她迅速化解了所有情緒糾葛——這令我深感驚嘆。她親自原諒了醫生，從她的言行舉止來看，從未對醫生懷恨在心或持續怨懟。

然而這並未阻止她提起訴訟。和解金讓全家得以購置更好的住宅，支付天主教學校學費，後來更供孩子們進入私立大學就讀。

進一步的反墮胎活動

初次化療結束後，露絲迅速恢復體力，再度投入旋風般的活動。約莫一年半的時間裡，她享受著看似健康的狀態。除了打理家務與持續參與主業團活動——例如每週為協助人授課——她還滿檔地奔波於哈佛神學院、霍利奧克山學院、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福坦莫大學、布蘭迪斯

大學、布朗大學及阿默斯特學院，進行反墮胎演講。

1992年最高法院作出凱西案判決後，露絲認為繼續致力推翻羅伊案已無意義。正如她在訪談中所言，其反墮胎活動（包括多次面向高中生的演講）旨在說服聽眾：

他們自己不願墮胎，或若知曉有人正考慮墮胎，或許能真正勸阻對方。或許我能說服某些人像我一樣積極行動。因此我努力做的事，就是說服人們這並非好事，世上存在更好的替代方案。

根據麥可的說法，露絲看待墮胎爭議，並非某種哲學命題的意見分歧——「胎兒是否為人？」——而是兩種文化的分歧：既然（眾所周知）女性子宮內的生命是活生生的人類，我們該遵循「所有人類在本質上平等」的原則行事，抑或採取「為解決問題而殺害某些人類是可被容許」的態度？前者是生命文化，後者則是死亡

文化。她認為這兩種文化正在爭奪她所面對年輕人的效忠，而她的關切在於教導他們應知之事，使他們得以選擇生命。

露絲不認同所謂的文化戰爭及其伴隨的修辭。她不斷尋求搭建橋樑、尋找共同點的方法，對象不僅是立場未定者，甚至包括墮胎倡導者。在墮胎爭議中與她對立的前「大眾選擇」組織主席，得知露絲的癌症已轉移至肝臟時，竟致函表達同情。露絲回信時字裡行間流露的親切與意外親密，令人動容：

我對現狀最常感到遺憾的一點，是沒有再添一個孩子。……對天主教徒而言，能幾乎確知死亡迫近，實為莫大恩寵。這些年來，我享受——不，是細細品味——的時光，遠勝過人生其他任何階段。我幾乎從日程中剔除了委員會會議，僅讓演講邀約帶我離開家人。我竭力營造家庭生活的寧靜、歡愉、趣味與溫情，自認已取得些許

(微薄的)成就。我既不畏懼死亡，亦不懼怕死後之境。必須坦承，偶爾我甚至渴望脫離這塵世紛擾。若你具備同理心，便能體會我們這些反墮胎人士在此國度生存何等煎熬。試想我們目睹女性將親生骨肉視為待滅敵人，拋棄天主賜予她們去愛與被愛的無價禮物時，內心該有多麼沮喪。正如德蕾莎修女所言：墮胎最深的罪惡，在於參與者心中愛的逝去。

涉入政治

露絲逐漸深入參與地方政治，成為地方有線新聞節目固定的政治評論員。她寫信給朋友：

又有一則趣聞。我受邀參加地方有線電視新聞談話節目——主持人想打造本地版的《麥克勞林小組》。他說我可以擔任他們的伊莉諾·克利夫特（那位進步派評論員）。我真想說「除非我死」——這更像是帕特·布坎南（右翼評論員）男扮女裝的樣子。。我覺得這會很有趣。你知道我向來熱愛辯

論。但誰能想到，當年在北谷中學的日子裡，我竟會成為正統天主教右翼共和黨人？

她還開始主持自己的每月電視節目，每次邀請反墮胎、基督教或維護家庭圈子裡的知名人士或領袖進行訪談。

即使在化療期間，露絲仍與友人瑪麗·穆拉尼攜手，成功阻止了計劃生育協會設計的性教育課程在伍斯特市實施。該課程強調「安全性行為」，並將婚前性行為視為完全合理的個人選擇。她們成立了「負責任性教育委員會」。短短數週內，該組織便動員數百名伍斯特市民，向校務委員會表達反對意見。她們不僅抵制原提案，更擬定替代課程的指導方針。露絲每次開會後都精疲力竭，卻仍堅持不懈，最終促使計劃生育協會的方案被撤回，轉而採用更為可接受（儘管仍不完美）的替代方案。

或許是受到這次行動成功的鼓舞，瑪麗決定參選校董會。當時已從化療中

康復的露絲積極投入競選活動，她統籌了向全市每戶家庭派發傳單的行動，並組織婦女們手持標語站在街角。儘管勝算渺茫，這些努力終究有了回報。露絲曾向友人坦言：「我熱愛政治。這是一場關乎實質利益的激烈競賽，但即使落敗，總有下一場選舉讓你重整旗鼓。」

露絲參與瑪麗的競選活動、反墮胎運動以及其他諸多事務，有時會引發家庭緊張。麥可回憶道，露絲從未在未徵詢他意見的情況下投入瑪麗的競選活動，而他總是熱情支持。但當真正需要付出犧牲時，他有時會抱怨不滿。他回憶起某次經歷。

某晚瑪麗競選活動期間，我們與五個孩子圍坐餐桌共進晚餐，正規劃著下週的行程。當時有幾場活動我真心希望我們能共同出席——如今已記不清具體內容——但當我逐一提及時，露絲卻反覆表示無法抽身：「我沒空，因為要協助瑪麗的競選活動。」此前

數週，露絲早已被照顧小孩的工作、傳單派發、策略會議等事務纏身。我忍無可忍，怒火中燒地站起身吼道：「去他媽的瑪麗競選活動！」隨即衝出餐廳。當我踏進廚房時轉頭望向露絲，她竟露出笑容，朝我比出中指，冷冷道：「那你也去他媽的！」

目睹全程的孩子們嚇壞了——因為我們幾乎從不在他們面前爭吵，更絕不使用粗俗言語。但爭執僅持續數分鐘，我自然當著孩子們的面向露絲道歉。

露絲同時也參與州議會候選人的競選活動。她協助修飾候選人的訴求，同時也負責裝信封、挨家挨戶拜訪，並在繁忙路口舉著競選標語站崗。

妻子、母親和朋友

露絲使徒工作的最顯著部分，在於領導反墮胎組織、參與辯論及參加電視節目。但其使徒工作的核心，實則奠基於祈禱、犧牲、對家庭的奉獻、以

友誼為基礎的深度對話，以及她以身作則的力量。她生命的本質，根植於妻子與母親的角色。一位友人如此寫道：

我常沉思露絲如何選擇成為妻子與母親，並在其中聖德日增。她確實展現了在日常瑣事中——無論是洗衣、開車往返兩地——於當下環境中逐漸成聖的典範……我認為她正是透過履行妻子和母親的職責，並將這些付出奉獻給天主而聖德日增。我認為她正是藉著這些時刻——當她祈禱並將工作奉獻給天主時——在聖德中成長。而這份恩寵賦予她力量，得以運用才幹完成其他事務。那些事務不過是額外之事。在她生命的中心，我認為始終是妻子與母親的角色。

露絲本人曾寫道：

家庭主婦不僅要承擔大量的體力勞動，還要承受聆聽孩子打架、哭鬧和抱怨所帶來的心理壓力。但我們卻擁有比大多數人更多的空閒時間去思考

自己的事情，以及與朋友聊天。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工作比這更吸引我了

露絲極為珍視友誼，並刻意深入認識每一位相遇之人。她的友人回憶道：「她總會迅速抓住任何出現的人。若不讓對方徹底自我介紹並交談一番，她絕不會放人離開。」例如瑪麗·穆拉尼——這位畢業於聖母大學的律師，在讀書會月會上結識露絲，她如此回憶：

我們兩個都不擅長閒聊，於是聊到了教會關於節育的教義是否絕對正確。露絲說教會的教導絕對正確，但我對此並不確定。第二天，露絲來到我家——我記得她步履蹣跚地走上階梯——懷裡抱著四本厚厚的書。她坐在沙發上，給我看了所有支持她觀點的引言。我當時震驚極了。我簡直不敢相信，一次普通的咖啡閒聊，竟然會促使一個剛認識的人回家收集資料、整理論證，然後再次橫跨整個城市，只為說服我承認自己的觀點是錯的。

從那一刻起，瑪莉就知道露絲是她想要結交的好朋友。回想起露絲對她生命的影響，她意識到：

真正觸動我的，並非是讀書會上的任何爭論或任何人的發言，而是只是看著露絲這個人。年輕的時候，你無法體會到為人母的喜悅。所以，露絲就是我的榜樣。關鍵在於：看看眼前的快樂，然後乖乖排隊。

露絲去世後，一位朋友與麥可交談，回憶道：

「我親眼目睹了露絲一天能做多少事。而且，你在謝爾比街的房子並不大，但露絲卻在那裡招待客人，感覺就像在家一樣。我們總是玩得很開心。看到這一點，我也更加敞開家門，邀請了更多的人來家裡做客。看到露絲一天做那麼多事，我也更願意去做很多事情了。」

另一位女士格蕾絲·查弗斯回憶說，她第一次認識露絲時，就被露絲的「快

樂和寧靜」所打動。「她身上有一種平和的氣質，而我沒有這種氣質，我渴望擁有。」這最終促使格蕾絲重新思考她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她不再生育的決定。她解釋說：

在認識露絲之前，我只是隨口否定了教會關於避孕的教導。從來沒有人挑戰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但露絲並沒有透過任何談話或教導來挑戰我，而是僅僅因為她是那麼多孩子的母親。我像現在經常聽到的那樣問她：「你有幾個孩子？」（人們會用難以置信的眼神看著我。）她只是非常愉快地解釋說，這是她信仰的一部分。她毫不懷疑，也毫不動搖。她只是欣然地這麼做。

格蕾絲發現自己對主業團的聖召後，感謝露絲為她祈禱。露絲家裡沒有洗碗機，她笑著低頭看著地板說：

「嗯，過去一年你一直在幫我洗早餐碗碟。」格蕾絲沒有多說什麼，但她心裡想：「哇，這就是主業團。」

癌症擴散至骨骼

1993年聖誕節前夕，露絲發現癌症擴散到骨骼。在聖誕信的結尾，她先是談到了孩子們，然後才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親朋好友：

1993年以一個令人難過的消息告終。我的癌症復發了，轉移到了右髖關節和脊椎。傳統醫學無法治癒轉移性乳癌，所以我的生命已進入倒數計時（幾年時間）。到目前為止，我和麥可（毫無疑問是超性地）接受了天主的安排。我們已經逐漸習慣了祂的旨意與我們不同。

露絲組織了一個玫瑰經小組，成員們每週聚會一次，帶著年幼的孩子，一起念玫瑰經，然後喝咖啡聊天。在一月份的聚會上，露絲告訴朋友們她的癌症已經轉移。「我會把我所知道的，關於我的病情和治療的一切告訴你們，但之後，我們還是聊點別的吧。」她解釋說，骨癌可以控制兩到三年，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以更久。

只要癌細胞還留在骨頭裡，她就可以接受荷爾蒙治療，這種治療的副作用不會像她之前的化療那麼嚴重。然後她拍手喊道：「好！——現在讓我們一起誦念玫瑰經，祈求麥可能找到一位年輕的妻子！」

為了孩子們，麥可需要再婚的想法並非一時興起。她曾對朋友們說：「最痛苦的是，害怕在孩子們還小的時候就死去。我的丈夫帶著六個孩子，再娶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痛恨孩子們在沒有母親的陪伴下長大。」在去世前不到三個月，在一次特別親密的時刻，再娶的可能性有多大？.....我痛恨孩子們在沒有母親的陪伴下長大。」在去世前不到三個月，在一次特別親密的時刻，再娶的可能性向麥可吐露心聲，她認為他應該娶他們朋友湯姆和珍·哈迪的長女凱瑟琳·哈迪。她寫信給一位朋友說：「我相信天主會安排一切，即使我們並不這麼認為。我完全相信，無論結果如何，天

主都會從這段經歷中帶來益處。」她也寫信給另一位朋友說：

「奇怪的是，死亡的前景並沒有讓我感到那麼困擾。我真的相信，無論上帝的旨意是什麼，最終都會是最好的結果。如果他想讓我在三十歲之前死去，我相信這其中必有益處。」我祈禱我所有的朋友都能擁有堅定的信仰，我的妹妹能與家人和好，我的孩子們能在信仰中成長——諸如此類。我再次懇請你念誦這張祈禱卡（向主業團創辦人祈禱）。他理應保佑我。他也以祝福那些虔誠念誦這張祈禱卡的人而聞名。我真心希望這也能對你有幫助。

得知癌細胞已擴散至露絲的骨骼，結束了她過去一年來對是否戰勝癌症的忐忑不安。露絲寫信給一位同樣被診斷出乳癌的女士，傾訴了這段經歷：

「當我被診斷為轉移性疾病時，我的疑慮就消除了。但那段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也並非全然沒有意義——它

讓我更加順服天主的旨意。現在，說來也怪，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快樂。我相信你也會發現，這段經歷讓你更加親近天主，相信祂有時難以理解的智慧，能夠從苦難中帶來祝福」。

露絲的醫生建議她接受一種常見的荷爾蒙治療，雖然有一些益處，但並不能治癒癌症。露絲擔心自己或許該堅持接受骨髓移植（BMT）療法。這種痛苦且令人虛弱的治療風險極高，因為免疫系統會被暫時摧毀，而且如果骨髓移植失敗，患者很快就會死亡。治療期間需住院數週，身體虛弱數月。但這或許能帶來長期生存的希望。露絲覺得，如果治療失敗，讓她所剩不多的時間被這種痛苦的治療毀掉，實在可惜。但她也擔心，或許正是因為她對天主的信德以及對升入天堂日益增長的渴望，她低估了治療的潛在益處。她花了數週時間閱讀醫學文獻，並諮詢專家。她最終決定不做

骨髓移植，但如果新的資訊指向骨髓移植，她仍然會考慮這種可能性。

與骨癌抗爭的五年

五年來，露絲的癌症一直局限於骨骼，這使她能夠過著非常積極的生活。她繼續著之前生活中的許多事情，甚至嘗試了一些新的事物。確診後不久，她的朋友斯沃普夫婦提議她生平第一次去滑雪。露絲欣然接受了邀請，和斯沃普夫婦以及她幾個較大的兒子們一起在新罕布夏州度過了一周的滑雪時光。到週末時，她已經能夠順利地滑下山坡而不會摔倒了。

露絲一直是個「社交達人」，但現在她更重視與家人和朋友共度的時光。正如她在信中寫道：

「我知道自己剩下的時間不多了，這讓我更願意放下洗衣和家務，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比如去聽好友的音樂會。這又引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就像『家族傳承』中應該留給孩子

們的是什麼一樣有趣)。當你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時，你應該如何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我很幸運現在沒有強烈的慾望去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真的很享受現在的生活狀態。但我確實覺得，多花時間陪伴自己喜歡的人非常重要。

1998年1月，露絲得知癌細胞已擴散至肝臟，生命只剩不到一年。當晚，她便前往當地一所學校，為孩子們演講。第二天，她參加了基督教教義兄弟會教師晚宴。再過一天，她又在一所高中發表了演說。兩天後，她開始接受肝癌化療，幾天後，她又為一百多名高中生做了演講。直到生命垂危，她依然堅持擔任堂區宗教教育主任，負責高中青年小組的工作，在主教座堂唱詩班獻唱，主持每月一次的讀書會，並為主業團協助人授課。所有這些，她都同時兼顧照顧家庭。

六月底，露絲與拉爾夫·麥金納尼教授在聖母大學共同教授了一門為期四天

的天主教基礎課程。八月份，在新罕布夏州與家人度假期間，儘管她的腿裡有一根鋼釘來加固被癌症侵蝕的骨頭，但她還是開車登上了新英格蘭最高的山峰——華盛頓山，然後徒步下山。

肝癌化療導致露絲提早停經，並深深影響了她的情緒。三月底，她寫信給一位朋友說：

我的情緒在深深的、痛苦的悲傷和一種寧靜的喜悅之間交替。我努力提醒自己，我應該為有機會將我的苦難與基督結合而感到高興。然而，當我真的感到痛苦時，這一切都蕩然無存。這真令人厭煩。還有一件奇怪的事，多年來，我感覺自己幾乎沒有什麼情緒，而且所有情緒的強度都相當合理。孩子們帶來的快樂，麥可難搞時我的惱怒，以及和他相處融洽時我的滿足，大概就是這些。現在，我的情緒似乎完全主導了我對現實的感知。

這一定是更年期。這感覺很奇妙，偶爾令人愉悅，但更多時候令人痛苦。

大約在同一時間，她寫了一封長信給一位不信教的高中朋友：

我的癌症無情地侵蝕我。它已經擴散到我的肺部和肝臟。我餘生都會接受某種形式的化療，而我的餘生很可能不會太長。但我並不抱怨。我的人生很精彩。我認識了很多很棒的人。我做過很多有趣的事。我擁有許多天賦和才能，讓生活充滿樂趣（唱歌、表演、演講等等）。我的丈夫很棒。我的孩子們也很棒。而我真心信仰天主教。人生短暫，它只不過是通往真正人生的一次資格考試。我很遺憾沒有經常寫信給你。你的友誼一直是我快樂的泉源。

1998年4月底，露絲再次寫信給這位朋友：

我並不害怕死亡——一點也不。我不僅僅接受天主教會的教導。自從我知

道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以來，我一直在認真思考我的人生意義以及我對死亡的理解。我熱愛天主賜給我的生命。我再也找不到比這更美好的生活了。但我深知，天主不僅是我生命的創造者，也是我所愛之人的生命以及這美麗奇妙世界的創造者。我渴望見到天主；我渴望看見那位創造這一切的天主。我無法想像祂會比祂所創造的一切遜色，當然，我也希望能在天堂見到所有美好的人，包括你，我（以及許多其他人）都對你感激不盡。此生短暫，而永恆——它就是永恆。

露絲又過了三個星期才寫完那封信，寄出去之前她又加了幾頁：

我不想顯得傷感，但這或許會成為我的告別信。我希望不是，但以防萬一，請容許我感謝你深厚的友誼，感謝你鼓勵我去了解並熱愛文學與文化的世界。雖然我不太擅長寫信，但我每天都在想念你，為你祈禱。

當然，我希望你能重拾你受洗時的信仰。真的，還能有什麼別的可能呢？根本沒有天主？天主存在，但祂從未與我們溝通？天主存在，祂與我們溝通過，但我們不知道是透過佛陀、穆罕默德、耶穌、其他人，還是以上所有？最後一種可能性似乎比前兩種要大得多。那麼，問題變成了：究竟哪一種偉大的宗教最有可能代表天主與人類的真正溝通？我毫不懷疑，如果你能運用你卓越的智慧來思考這個問題，你很快就會意識到，天主教會的存在除了以下事實之外，別無解釋：那位名叫耶穌的拿撒勒人確實死了，祂的屍體確實復活了，他確實四處行走，與那十一位平庸之輩交談，而正是這十一位門徒，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進程。而且是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好了，再次感謝，再見。帶著愛與感激。

死亡

九月初，露絲臥床不起，需要吸氧氣。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天，許多人前來為她祈禱，或只是陪伴在她身邊。她於1998年9月23日下午去世。那天下午，數十人自發性地前來。那時還沒有手機，沒有人發訊息，他們彷彿「知道」了什麼，然後就來了。在她彌留之際，他們守候在她身邊。正如主教座堂的神父兼好友所觀察到的：

教堂裡擠滿了人，大家圍坐在一起祈禱，與她一同祈禱。我相信這給了她力量.....其實，如果只是靜靜地陪伴家人，而不是像除夕夜那樣敞開大門，或許會更容易。但讓那些人進來，親眼目睹她虛弱的身影，見證她生命的最後時刻，以及她身上所展現的偉大尊嚴，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露絲去世時，就像她生前一樣，被她愛的人和愛她的人圍繞著。

Photos courtesy of
www.ruthpakaluk.com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zht/article/Lu-Si-Pa-Qia-Lu-Ke-Qi-Zi-Mu-Qin-Peng-You-She-Hui-Yun-Dong-Zhe/> (2026年3月12日)